

梁漱溟特立獨行

(本文插圖刊第5頁)

●王重則

鑽研佛學任教北大

梁漱溟先生已於一九八八年(民國七十七年)六月廿三日在北平協和醫院逝世，享年九十五歲。他是一個舉世知名的哲學家、思想家、社會活動家和鄉村建設派的提倡者，同時也是「中國民主同盟」的發起人之一，國共和談的參與者。在他九十五歲的人生波濤中，他的終生守正不阿，風骨嶙峋的人格與處世態度，為人們所稱頌。他有強烈的正義感並深切關懷人民的疾苦，他的梗直敢言，當權者都不喜歡他。

梁漱溟生於清光緒十九年(一八九三)，原名煥鼎，字漱溟。梁氏祖籍雖為廣西桂林，但他一直住在北京，並且是一個蒙古後裔。據汪東林「訪梁漱溟問答錄」中梁先生本人說：「我們家祖先與元朝皇帝同宗室，姓也木帖耳，蒙古族。元亡，末代皇帝順帝攜皇室親屬逃亡北方即現在的蒙古，而我們這一家沒有走，留在河南汝陽，改姓梁，取自『孟子見梁惠王』一語，至十九代梁廬由河南遷廣西桂林居住。梁廬的兒子即我的曾祖父梁寶書，應鄉試中舉人後，又進京殿試中

進士……此後全家便在北京住下。」

梁漱溟的個性和人生觀，受他父親梁濟(巨川)影響很大。梁濟做過內閣中書、內閣侍讀，從七品官做到四品官。官位雖不大，但對清廷十分忠心。清亡之後，梁濟痛不欲生。一九一七年張勳率領辦子兵進京復辟，梁濟內心燃起一點希望，但張勳事敗後躲進荷蘭使館逃命的舉動，傷透了梁濟的心。於是他在一九一八年六十歲的生日時，跑到北京積水潭投水自殺，以殉清朝。

梁濟幼年所受的教育和家中先輩樹立的楷模，讓他長期浸潤在充滿了儒家文化氣息的環境中，並將他塑造成一位有教養的儒者。因此，他深稟儒家「內聖外王」的教訓，亟欲就此一展抱負。可惜他不在外王的事業上，因不肯曲意逢迎，以致仕途坎坷，空有一副用世的熱忱而不得施展，只好轉而企圖在內聖(即道德)上面，對社會人心有所影響。於是才選擇了「自殺」的道路，希望借此來挽救清末民初道德淪喪的政治與社會狀況。

梁濟一死，的確在當時引起很大的反響。陳獨秀辦的「新青年」雜誌，曾為梁濟的自殺問題

展開一場討論，陳獨秀、胡適、李大釗和陶孟和等人都寫過文章。有人認為梁濟的自殺，不是單純為前朝殉節，而希望透過殉清的行爲，喚醒世人對儒家「忠心」的觀念，這畢竟比空談共和政體要好得多，唯有忠誠地為實現共和政體的理想而努力，才是當務之急。持這種觀點的人，也許有一定的道理，因為梁濟雖然心存清室，但在思想上却不是一個守舊的保守派。梁漱溟六歲(一八九九年)時，即被梁濟送到當時最早開辦的新式小學校中西小學堂，開始學ABC，而放棄傳統的四書五經。梁漱溟在中西小學堂唸兩年書之後，即轉入北京南橫街公立小學堂、啓蒙學堂和順天中學堂。這些都可以說明梁濟不是一位頑固的保守派。

梁漱溟在順天中學堂的五年半中，加入了京津同盟會，碰上了武昌起義。他在辛亥革命後，又當上了「民國報」的記者，並和沈鈞儒一起擔任司法總長張耀曾的秘書。

梁漱溟的學歷不高，只不過中學畢業，但他的苦讀自學，遠遠超過大學水平。他傾力鑽研佛學和哲學。他二十四歲時，經教育總長范源廉的

介紹，認識北大校長蔡元培。當時他的「究元決疑論」正在「東方雜誌」上連載。蔡元培頗為欣賞。梁漱溟說：「過了不久，蔡先生約我與陳獨秀先生會於他校長室（陳先生是新聘的文科學長，相當於文學院長），談論要我到北大擔任印度哲學專門課。我當即說，據我所知，無論西歐和日本，講印度哲學並不包括佛學，一般都是講六派哲學。而我自己對六派哲學素不留意，僅僅是對佛學有興趣而已。要我教印度哲學，怕不能勝任。蔡元培回答說，你固然不甚懂印度哲學，也沒有發現旁的人對此更精通。誰也不過知道得一星半點，橫豎差不多，你就大膽來吧。」

於是，未上過大學，也未出過洋的梁漱溟就大膽地到了北大紅樓，與當時名噪一時學者陳獨秀、胡適、周作人、魯迅和李大釗等人共事了七年（一九一九——一九二四年），北大兼容並包、新舊雜陳的自由學風，使梁漱溟的思想深深受到影響。

梁漱溟早年讀佛學，十八歲那年拒絕父母為他訂婚，從十九歲那年開始吃素，一度想出家當和尚，但這個理想並未實現，後來經過兩次婚，可是在飲食方面，是個終生不渝的素食者。

尊崇孔子服膺儒家

一九二一年他著的「東西文化及其哲學」一書出版，風行一時。他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種類型，一、西方文化的內容是動的、向前的、科學的；二、東方文化即中國文化的內容是靜的、保守的、重視精神生活；三、印度文化的內容既不同

前，也不持中，而是翻轉向後，是一種畸形發展。

他在二十九歲時，才從佛家回到儒家，從此以後以儒家自居。他與他父親梁濟一樣，認為只有儒家文化的精髓才能救中國，使中國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道路。他認為人性的從善，父慈子孝、兄弟恭和仁民愛物的基本德性，是治理天下與文化改造的出發點和原動力。即使在中共發動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時，也未改變他的信仰。他在「批判批孔」時，他曾寫了一篇：「今天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」文章，來敘述他的看法，他說：「我的看法是，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，孔子是接受了古代文化，又影響着他之後的中國文化的。這種影響，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古人都不曾與孔子相比。他生活在二千五百年和後二千五百年的中間，他本人是承前啓後的。」在那殺人不眨眼的「文革」時代，敢寫這樣文章，這要拿出多大的勇氣來！

一九二四年夏，梁漱溟辭去北大講師之職，到曹州主持山東省立第六中學，第二年即返回北京，開始摸索建設中國的藍圖。他說，他所期望的是能替中國民族在政治上、經濟上開出一條路來。他想從「鄉治」開始，他最先在廣東試辦鄉治，然後發展成為「村治」和「鄉建」，這些都是他教育思想的一部分，他認為講學和做學問，都要和社會活動結合起來。不能單純地在課堂上講哲學，也不能關在書齋裏單純研究，應該有言有行，與改造社會溶為一體，這樣才能使社會進步。一九二九年，梁漱溟到河南輝縣石泉出任村

治學院教務主任。一九三一年初，梁漱溟又到山東鄒平縣設立鄉村建設研究院，兩年後，研究院進一步擴大，增加了荷澤縣為實驗區，再過兩年，實驗區增加了十四個縣，訓練學生約三千多人。梁先生放棄北大的講師不當，而去搞鄉村實驗，他不求名不求利，心中只有一個信念，要將國家從鄉村開始改造成一個富強的國家。

這歷時七年多的社會實驗，在當時收到了顯著效果，例如在實驗區內的鄉村社會秩序有明顯好轉，經濟也有很大發展，文化教育和民俗風俗等都得到進一步提高，所有這些新氣象，都說明他的理想，得到了肯定的驗證，是一條成功之路。但是局部的鄉治、村治和鄉建，畢竟不能解決整個中國鄉村所面臨的問題。因為當時中國四分五裂，他的試驗成功也不能推行全國。

撰述中國文化要義

為了統一中國，消除內戰，他積極關心國是，參加政治活動，三十年代末期，他以鄉村建設派的身份，與張瀾、沈鈞儒、黃炎培等人籌組了「統一建國同志會」，一九四一年擴大改組為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，並在香港創辦「光明報」，梁漱溟出任社長。這時他一面辦報，一面埋頭寫另一本巨著「中國文化要義」。一九四四年九月，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改名為「中國民主同盟」。

中共佔領大陸後「民盟」是中共所謂的民主小黨派之一，全是花瓶組織，他們沒有各自的黨章，沒有政治目標，這那能算是什麼政黨呢！

國共和談期間，梁漱溟一直是熱心的參與者，他所代表的「第三種勢力」既得不到國民黨的支持也得不到中共的歡心。周恩來會指着他的鼻子罵過他：「你這個出賣朋友的東西，中共那一點對不起你，你如此不講良心，我不能接受你這個方案。」周恩來的粗魯作風，一點不亞於毛澤東。

大陸陷共後，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一日中共慶祝「國慶」時，梁漱溟也被請上天安門觀禮，四大不要臉的郭沫若代表民主黨派、無黨派民主人士向毛澤東獻禮，旗上由郭沫若寫着一行字：「我們永遠跟着您走」。梁漱溟說：「我看了直搖頭。這句話可能代表若干人的意思，但不代表我，我口中是說不出這句話來的。」這裏有必要引用王康先生在「閒話梁漱溟與毛澤東」一文中所記的史實，那時王康是記者，他寫到：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大戰爆發，不久日軍攻占香港，梁漱溟、柳亞子從香港逃到桂林，梁漱溟當時對桂林新聞界發表他未死於戰火的感想說：『如果我死了，天地會為之變色，歷史會為之改轍。』」好大的口氣，當時全世界有資格說這種話的人只有蔣介石、羅斯福、邱吉爾和史大林四人。梁漱溟不過一介書生，怎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？直到他後來憑一枝筆和一張嘴居然與獨夫毛澤東對抗，我才相信他說的話有道理。

梁漱溟最喜歡引用一句話，就是：「國可奪帥，匹夫不可奪志。」

忠厚性格儒者傳統

實際上梁漱溟能在一九五三年九月中旬中共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」第二十七次會議上，他以政協委員列席，並應周恩來之邀對中共農村工作發表意見。他基於他個人早年對農村實驗的經歷，提出了對中共農村政策的批評。他剛直不阿，直接了當指出了農民的窮苦生活，他不像四大不要臉的郭沫若、韓素音之流一味奉承。

梁漱溟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」，所以他一開頭就說：「你們共產黨有沒有這種雅量聽我把這些話說完。」緊接着他就批評中共對工人、農民一天一地的政策，工人在天上，農民在地下。

毛澤東坐在主席臺上，面目鐵青，咬牙切齒聽着梁漱溟的講話，心想：「梁漱溟這小子實在不識抬舉，竟敢在老虎嘴上拔鬍鬚，真是敬酒不吃，吃罰酒。我今天賞給你個政協委員位置，是讓你來歌功頌德的，可不是讓你來批評的。前賬未了，又結新賬，瞧我給你點厲害看看。」

原來梁漱溟和毛澤東同在一八九三年出生，而梁反比毛早出生七十天。梁漱溟和毛澤東第一次碰面，是一九一八年初，二人剛二十五歲出頭，正值毛澤東落第失意，寄寓楊懷家中，而梁漱溟却以北大同事身分，常常訪問楊懷中，出來開門的多半是毛澤東。梁漱溟以為毛澤東是從湖南來投奔楊懷中的鄉親，便不會留意，更不向毛通報姓名，直入客廳與楊懷中相談。後雖經楊懷中一再稱道毛澤東，但梁漱溟竟未放在心上，連毛澤東的名字也未記住。

雖然梁漱溟並無輕視毛澤東之意，但毛澤東

一向胸襟狹窄認定梁漱溟因少年高就，眼高於天，直視自己為無物，從此便結了冤仇。

一九三八年初，梁漱溟以無黨派人士身份隻身赴延安參觀。當時毛澤東已是中共主席，武裝割據一方，早已不是昔日吳下阿蒙，而梁漱溟早已忘記二十年前楊家那段公案，更不知面前的毛澤東即是昔日的應門者。

二人相見，毛澤東操着濃厚的湖南鄉音第一句話就點醒梁漱溟：「梁先生，我們早見過面了，您記得不記得？民國七年，在北京大學，那時您是大學講師，我是小小圖書管理員。您常來豆腐胡同楊懷中先生家串門，總是我開大門。」五十年後，梁漱溟提起這次延安之會，還驚嘆毛澤東的「好記性」。梁漱溟畢竟是個真君子，未免太忠厚老實了，居然沒有在「大學講師」、「小小圖書管理員」、「總是我開大門」等話語中，聽出毛澤東牙齒摩擦的聲音，一心還以為毛澤東真的在和他敘故人之情呢。要知道，一九一八年梁漱溟在楊懷中家中的「有眼不識泰山」，毛澤東認為是他一輩子的奇恥大辱，其怨恨刻毒，如背上之痛，附骨之疽，除死方休，又那肯這麼輕易忘記呢！

所以還未等梁漱溟將話說完，舊怨新仇一起湧向毛澤東的心頭，毛澤東霍地從座位上站起，也顧不得自己的「主席」身分，活像是一個紅了眼的市井流氓，破口大罵：「蔣介石是用槍桿子殺人，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。偽裝得最巧妙，殺人不見血的，是用筆桿子殺人。你就是這樣一個殺人犯。……梁漱溟反動透頂，他就是不承認。他

中外雜誌

說他美得很。……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？你一生一世對人民有什麼功？一絲也沒有，一毫也沒有。而你却把自己描成了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，比西施還美，比王昭君還美，還比得上楊貴妃。……『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』，人不害羞，事情就難辦了。說梁先生對農民問題的見解比共產黨還高明，有誰相信呢？班門弄斧。……梁漱溟是野心家，是偽君子。他不問政治是假的，不想做官也是假的。……

「梁先生自稱是有骨氣的人，香港的反動報紙也說梁先生是大陸上最有骨氣的人，臺灣的廣播也對你大捧。你究竟有沒有『骨氣』？……你跟韓復榘、張東蓀、陳立夫、張羣是什麼關係？向大家交代交代嘛！……傅先生（作義）在和平解放北京時，爲人民立了功。你梁漱溟的功在哪裏？……」

「你的路線是資產階級路線。實行你的，結果就要亡國，中國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，北京就要開會歡迎蔣介石、艾森豪威爾。」

毛澤東常說，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人民都擁護共產黨，照他的說法，蔣介石、艾森豪威爾來，應該是全國同仇敵愾人人奮戰才對，怎麼會開歡迎會呢？原來就在他放肆的潑婦罵街時，也露了馬脚，他自己也知道他的政權是不得人心的。這就暴露了毛「稱王稱帝」之後，獨斷專橫，在內戰時，他爲了統戰目的，掛在嘴邊上的民主自由，早已拋到九霄雲外，由於他出身微賤，心小如豆，凡對他有仇的，一定要報，想不到二十多年前梁漱溟在無意中得罪了當今這位帝

王，竟落得這般下場。

保有人類尊嚴而逝

從此以後，毛澤東發動全國輿論批判梁漱溟，攻擊梁漱溟，幾十年不讓他有說話的自由，也不讓他有不說話的自由。

在文革時，梁漱溟一家掃地出門，他被批鬥時，家具和藏書也都被摧殘燒燬，在那瘋狂的年代，他也無力反抗，只要求破壞者讓他保留一部字典，因爲那部字典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。燒掉了會對不起朋友。然而這部字典還是不能倖免，終於被燒掉了。但從這件事上，也可以看到他那來自傳統知識分子的忠厚性格。梁漱溟並不贊成階級對立的社會分析，他強調中國是職業分途；

爲什麼職業分途而不是階級對立，正因爲中國是以倫理爲本位，以道德理性爲核心，梁漱溟深信「人性」有其優先性，足以面對問題，消除癥結，使人間社會運轉順暢。他認爲中國民族有自覺自救的能力。他認爲歐美資本主義之路和蘇俄共產主義之路都是行不通的。惟一的通路是經由他設想的「村治」（鄉村自治）而喚醒全國民族的自覺。雖然他這套理論，在今天很少覺到知音，但他熱心關心天下事，不懼暴政對他的迫害，仍能冷肩以對，就其生命的意義和人類尊嚴來說，他無疑是照亮中國漫長黑夜的一盞永不熄滅的明燈，他必將像儒家學說一樣，長存於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中。謹選錄梁先生所撰「道德——人生的實踐」一文，以饗中外讀者。

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著

全一冊售一八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全一冊售一八〇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